

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與族群議題

孫嘉穗（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原住民媒介中的性別呈顯，牽涉到各原住民族原有的社會與文化中的性別規範與禁忌。在新聞產製中，性別因素影響著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從採訪到播報的各個環節，進而影響新聞成品中的族群性別影像。為了理解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在職場上面對的性別處遇，以及原住民媒體涉及的性別議題，本研究訪談原住民族電視台「族語新聞」的各族原住民主播、記者，以及「每日新聞」的新聞部副理與製作人，探究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各族群的新聞產製，在爬梳與理解相關問題之外，整理出可著力與培力的目標，期使原住民媒體能以更具性別意識的觀點來製作族群新聞，並凸顯各族多元的性別圖像。

關鍵詞：性別、族群、媒體、原住民新聞、原住民記者

一、前言

本文研究原住民新聞報導與族群文化中的性別議題，探查族群與媒體的諸多面向，包括原住民族電視台（以下簡稱原民台）如何在分配新聞路線時進行性別分工，如何重視原民新聞事件中的女性角色，如何從性別觀點報導原民祭典等文化活動，如何處理與性別有關的文化轉譯，以及如何培力原住民新聞工作者等問題。

原住民媒介中的性別呈顯，牽涉到各原住民族原有的社會與文化中的性別規範與禁忌。在新聞產製中，性別因素影響著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從採訪到播報的各個環節，進而影響新聞成品中的族群性別影像。為了理解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在職場上面對的性別處遇，以及原住民媒體涉及的性別議題，本研究訪談原民台的各族原住民主播，探究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各族群的新聞產製，在爬梳與理解相關問題之外，整理出可著力與培力的目標，期使原住民媒體能以更具性別意識的觀點來製作族群新聞，並凸顯各族多元的性別圖像。

在原住民媒體的新聞影像裡，可見到蘭嶼大船下水典禮，達悟族的男人扛著傳統舢舨下水，以身體體現該族的文化與尊嚴；陽光下，奮力划動的船槳濺著水花，族群文化在新聞影像中傳承，航向湛藍的海洋。阿美族的傳統海祭，男子依循年齡階級的部落禮序參與儀式，女子卻因性別禁忌而被摒絕於重要儀式之外，禁止進入祭場。傍山林而居的族群，如布農族的射耳祭及太魯閣族的祭典儀式，可看到善獵的男人奔騰於山林，傳授年輕男子射箭的技巧。新聞影像呈顯著各種男人饒富族群意涵的文化身影，而女人呢？族群媒介中的女人是

致謝辭：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主編與編委會提供的指正與寶貴建議，謹此致謝。

否逸失在報導的焦點外？如同許多無法參與的祭儀，她們也同樣處於新聞與媒體呈現的邊緣，甚或消失（孫嘉穗，2013: 134）。

本文旨在探討如何發展出具性別意識的原住民族群新聞，研究問題聚焦於性別、媒體與族群三個向度。由採訪與播報等新聞產製面向，透過訪問原民台 13 族原住民主播與記者，析論性別議題如何影響原住民新聞的樣貌，以及性別空間如何影響原住民新聞之產製。本文並探究原住民女性的身影何以逸失於新聞報導中？原住民文化場域與祭儀的性別禁忌，如何影響記者進入新聞現場採訪？原住民主播播報新聞時，性別議題在文化轉譯的過程遭逢何種問題，並對新聞內容造成哪些影響？

本研究從性別與族群的視角，檢視原住民新聞的產製、採訪、播報、族群特殊性等面向，析論原住民新聞與性別之多元關係。研究問題主要聚焦於下述層面：

1. 性別與原住民新聞之關係，性別議題如何影響族群新聞的產製？
2. 報導原住民新聞有何性別禁忌？性別禁忌又如何影響新聞產製？
3.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原住民各族主播的播報？
4.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原住民族語新聞主播的文化轉譯？
5. 如何產製具有性別意識的原住民族群新聞，並進行原住民記者與主播的性別培力？

二、文獻探討

（一）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

原住民媒體中的性別議題包含族群和性別兩個面向，多元文化主

義和女性主義的論辯則涉及族群和性別間的衝突與權力關係。將原住民傳播中的性別問題置放到相關的論述脈絡檢證時，需考慮族群新聞的製播除了為族群發聲外，是否也同時關注其中的性別議題與媒體工作者的性別處遇。

女性主義是否與多元文化主義衝突？張錦華（2014: 76）在關注族群內的權力壓迫，如性別歧視和階級壓迫等問題時，也提醒我們：不僅要肯認少數族群的文化特質，亦須檢視具壓制性的族群文化特質，當後者抵觸多元文化主義所主張的包容和肯認時，應有更細緻的思辨。

報導原住民文化新聞的記者，為了尊重族群的倫理規範，在產製新聞與進入文化場域時，是否會因性別身分而產生差異？對於族群傳統慣習的尊重，會不會導致其性別意識受到壓抑？身處其中的記者如何因應，又如何生產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遂成為本文所欲探究的問題。

原住民新聞的製播，涉及各族群在既有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性別分工、性別角色，與族人在祭儀中擔負的不同任務，也牽涉到祭儀所規範的性別禁忌與性別場域。採訪時，媒體工作者需遵循部落規範，依各部落原有的方式進行，包含女性時常無法進入祭儀的情況。但無法進入現場要如何採訪新聞？女性文字記者是否只能依賴男攝影記者進入祭儀拍攝畫面？相對於女記者受到的限制，噶瑪蘭族女祭司也不能接受男記者採訪，導致新聞的製播過程產生與性別相關的主導問題。此外，採訪主任編派工作時，是否會因許多原住民祭儀的場域不許女性進入，所以一開始就安排男記者採訪，而讓女記者失去學習傳承文化的機會？這些都是採訪原住民新聞時所需面對的族群和性別問題。

張錦華引述 Susan M. Okin 等學者（1999，轉引自張錦華，2014:

78) 的觀點：「多元文化主義強調保護文化和認同政治的結果，往往流於變相地維護族群內部既有的父權體制（當然也有母系的族群社會），延續了族群內部男性壟斷政經權力及文化規範解釋，無法改善女性的受壓迫處境。」Okin 也認為「性／別歧視涉及婚姻、財產、親子、職業、個人發展、法律規範等社會各面向，影響個人尊嚴和生命意義極為深遠」，因而主張應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反對族群文化中的性／別歧視，提升族群內的女性權益。

因此，製作性別相關的族群新聞時，應避免新聞中的性別歧視，並透過具性別意識的新聞產製來凸顯問題，對歧視女性的制度提出反思，也對產製過程中涉及性別議題的新聞倫理制定規範。

張錦華（2014: 61）說明族群壓迫的結構是包含社會各層面的整體性結構，它同時是階層的，也必然是性別的。她引述 Joe Kincheloe 與 Shirley Steinberg（1997: 137）的觀點，強調批判觀點的多元文化主義在討論壓迫結構時，不能忽略既有的父權結構的權力問題。族群內部的性別社會化和屈從位置，以及主流族群中的性別權力結構，都可能一再加深族群女性的不利處境。例如黑人女性主義就強調她們受到來自種族（白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階級和性別的三重壓迫（Weiner, 1994: 147，轉引自張錦華，2014: 62）。

陳昭如（2013: 154-156）則提及在多元交織壓迫的諸種形貌中，原住民與性別身分交織的難題：原住民女性所處的困境常隱而不顯，性別平等與族群平等的糾葛亦牽纏難解。她認為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不應被視為對立，不該以性別平等之名否定原住民文化，而應讓原住民的族群關切與性別平等並存。

然而某種情況是否為性別歧視，仍應從該族群的文化與知識體系來考量，如西方國家對於穆斯林女性面紗的論述，便曾引起許多爭

議。例如法國禁止婦女在學校及公共場合戴面紗，認為那是對女性的歧視，然從穆斯林女性的觀點視之，不少人卻認為面紗是其文化的象徵及文化特色的具體展現。

部落對待女性和女記者的不同方式，以及禁止女性進入祭儀場域採訪而造成男女記者的處遇差異，是否為對女記者與女性的歧視，應該從部落的觀點出發來檢證，亦即在原住民知識體系的脈絡下理解相關問題，而不是純粹移植西方女性主義觀點來做評斷。因此，本文以原住民記者的訪談為根據，檢視原住民女性記者在採訪和播報中的性別處遇。

原住民新聞的報導應同時注重男性與女性的發聲，然而原住民女性的發聲有多難？洪仲志（2014）在書寫原住民婦女的生命歷程時，提及自己的母親與族人婦女為了不被歧視與欺侮，在面對族群身分與性別處遇時，常以原住民的認同為優先，但卻也有不甘，想要用女人自己的話來陳述女人自己的生命經驗。他也提到「男人用保護跟女人換聲音，沒了聲音女人只得聽從男人訂下的規矩—女人順從—保護的模式就成立了。這高階版的保護模式，十分複雜，也常常不被查覺」（洪仲志，2014: 51）。這種以保護為名的操控，在面對族群的性別禁忌時，又會如何影響原住民新聞的產製，也成為本文所欲探看之處。

女性平權的訴求常在爭取族群共同權益的需求下被壓抑，日本愛奴族的女性主義者在爭取女人的權益前，也必須先接受爭取原住民基本人權的脈絡和歷史；不僅如此，她們還要面對主流族群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與不同意識形態的壓力，被認為其主張缺乏性別觀點。這反映出女性主義者在階級與社經地位上的差異。在復振愛奴族文化、重新創造傳統的運動實踐中，性別勞動分工並未被當成歧視，而被視為愛奴族整體世界構成的綜合文化空間。年輕的女性被期待傳承宗教文

化、學習部落祭儀，男性則著力於爭取政治權力，從而形成下述對比：女性進行文化生產，成為文化領袖；男性進行經濟生產，成為政治領袖（Lewallen, 2010: 155-160）。

王嵩音（1998: 242-243）對於原住民新聞實務的建議，除了提醒不同族群的新聞從業人員需利用訪談，多理解原住民的觀點和立場，也強調漢人新聞工作者應重新思考新聞價值，避免習慣性地以主流媒體的新聞價值判斷事件或現象，期使原住民新聞不再是衝突取向或負面新聞。她指出「主流媒體認為不具有價值的事件，或許對原住民卻很重要」，並主張非原住民新聞工作者要擱置傳統新聞的思考，發掘對原住民有意義的消息和資訊。

綜合上述觀點，本文探查原住民新聞從業人員在尊重部落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如何檢視所在的性別處遇，進而產製具性別意識的新聞；對於因性別因素而無法進入特定場域採訪的情況，記者又如何因應。本文在尊重各族社會與文化之傳統慣習與性別分工的同時，也思索如何能提升部落的性別意識，改善新聞工作者的採訪現況，並尊重原住民女性工作者的專業角色。

（二）性別新聞學

Carolyn M. Byerly（1995: 110）在論及新聞和女性的關係時，指出女性新聞工作者具潛在的中心位置，可藉由新聞故事報導女性的觀點與成就，促進性別發展。原住民新聞的製播若能從性別角度關注原住民女性的觀點與她們在各部落的發展，應能藉媒體報導提升部落的性別意識。

在探論性別與新聞的關係時，女性在新聞中的再現與出現比率，

記者的性別與硬、軟性新聞的產製，以及新聞室中的路線分工所涉及的性別權力分配等議題，常是性別新聞學的關切焦點。

依據全球媒介監督計畫（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做出的結論：「我們在新聞裡看見的世界，是一個實際上看不見女性的世界」（Global Media Monitoring Report, 2005: 17-18，轉引自 Hodkinson, 2011 / 黃元鵬、吳佳綺譯，2013: 251）。此研究分析全世界的新聞內容，發現男性出現的數量遠高於女性，比例約 5:1，且在任一重要新聞標題中，女性出現的次數皆少於男性。此外，當新聞內容出現所謂的「專家」訪談時，83% 都是男性。雖然談及媒介記者的數量時，情況稍好些，女性約佔 37%，但提到政治與政府等較「硬」性與「嚴肅」的新聞議題，則仍由男性主導。

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再現也常出現男多於女的情況：經常成為新聞焦點的各族祭儀，大多透過男性的身影來描述，各種政治或硬性新聞與專家角色的報導，也多呈現男性的聲音與視角。原住民新聞報導中的性別失衡，固然部分導因於複製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模式，但新聞的再現更決定於媒體工作者在新聞室中的路線分派與性別權力關係，以及記者能否以具性別意識的觀點來製作新聞。

Sinikka Torkkola 和 Iris Ruoho（2011: 212）在論及新聞裡的性別平等時，也質疑硬性新聞總被置放到較高位階的傳統：記者在主流媒介中，常須證明自己能報導政治、經濟或運動等新聞，女性記者則因這些多被劃歸為男性的領域，而在專業上未受到相對的重視。研究結論並指出，增加女性媒體主管與改變新聞慣性，或可促進新聞的性別平等（Torkkola and Ruoho, 2011: 217）。

有關女性新聞學的論述，部分學者認為在新聞內容方面，女性記者的增多使硬性與軟性新聞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並導致定義上與「人

情趣味」更為接近的新聞議題產生；但也有學者質疑「女性工作者會無可避免地將『女性觀點』帶入新聞報導中」的論述（Hodkinson, 2011 / 黃元鵬、吳佳綺譯，2013: 6）。

主流媒體以硬性和軟性來區辨新聞的重要性與性別製作取向，然此觀點放到原住民新聞的脈絡中並不一定適切。原民台的首要宗旨之一是傳承原住民文化，而文化新聞包含多種層面，由女性記者製播富含人情趣味的軟性新聞，往往承載著部落文化的豐厚底蘊，以最貼近部落的細膩視角，展現強大的生命能量與人情故事。

Cynthia Carter 等學者探討男女新聞工作者是否說著不同的故事，並關注意識形態、性別與新聞議題的關係，指出新聞產製並非都是同性的過程，訪談對象包含不同性別，記者和編輯的性別也會影響新聞產製，特定議題並非只有男性或女性能報導，硬、軟性新聞與工作者的性別需要更細緻的分析，不應將性別視為「女人和新聞」的「問題」或「媒體的女性化」，也應把焦點放在男性和新聞的產製上（Carter, Branston, and Allan, 1998 / 吳富盛、陳芸芸譯，2004: 286-287）。

Rosalind Gill（2007: 113-114）說明新聞做為一種文化產品，受到種族、性別、階級、財富、權力和國族等因素影響，而決定何人或何事為重要。Gill 也指出，多數的新聞是為男性設計，內容是關於男性，議題亦由男性來決定。因此，女人在新聞中如何被呈現，女性新聞工作者是否述說著不同於男性同儕的故事，以及新聞是否女性化，都是新聞專業中的性別議題所需關注的面向。她還強調需關切女性是否能製作出異於男性的新聞，她們是做出帶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新聞，抑或只是把新聞做得女性化，兩者的差別又在哪裡（Gill, 2007: 124）。Linda Christmas（1997, as cited in Gill, 2007: 124-125）在調查

中指出，女記者的報導方式和對於重要新聞的判斷皆異於男記者，大量進入新聞專業的女性工作者不僅改變了新聞本質，也聚焦在更多人感興趣的故事與健康、教育和家庭議題；就算選擇相同的議題，女性工作者也會用不同的方式書寫，使新聞與生活相關，議題更個人化而富人性；她們想和閱聽眾溝通，因而將讀者的需要置於政策制訂者之前，傾向做更多人物而非議題性的新聞，並把新聞放在脈絡中，解釋事件的關聯性。

但也有學者進行跨國研究，導出不同的結論：Thomas Hanitzsch 和 Folker Hanusch (2012) 在包括 18 國的跨國研究中，發現無論在個人層次或新聞室，男女並無太大差異。性別和新聞的關係可能更為複雜，不能單純認定男性記者就有怎樣的報導方式，或女性就傾向何種模式 (Sakt, 2004, as cited in Hanitzsch and Hanusch, 2012)。

因此，檢視性別與新聞的關係時，須檢證性別因素對新聞產製與閱聽眾之影響，並關注如何製作出具性別意識的新聞，而非僅是包含女性的新聞。此外，性別和新聞的關係亦受多方因素影響，如階級造成的差異處遇，與各族群特有的性別文化慣習，故須放在原住民知識與文化社會脈絡下觀看。

張敬婕 (2009: 229) 則提醒，在論述性別與傳媒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圖景時，由於女性紀錄普遍缺乏，女性象徵傳統應成為待梳理的寶貴資源；它們在什麼時代及何種社會背景下產生，都構成社會文化的重要成分，對各種文化範型的形成與發展，都發揮了基礎且影響深遠的作用。用這個論點來檢證台灣女頭目所面對的社會變遷，或阿美族女巫師的變貌，皆可成為饒富族群文化特性與性別觀點的新聞題材，見證著族群的變貌與女性生命史，呈現族群女性的性別處遇。

(三) 原住民族性別禁忌與新聞

身為原住民的主播和記者，與其他族群的主播在性別相關議題上有何差異？前者所需面對的採訪對象與場域，牽涉到許多部落知識體系與性別相關的倫理規範和禁忌，故其採訪與新聞產製過程，及族人閱聽眾的接收情況，都會因性別處遇而與一般採訪不同；在新聞與部落性別角色的銜接過程中，有著多面向的考量。

部落中的性別分工，表現於祭儀便是各司其職：如布農族的射耳祭通常在四月舉行，為迎接祭典及準備儀式所需的鹿耳，村中的成年男子會上山到獵場打獵，婦女則配合打獵回來的時間準備釀酒（田哲益，2003: 109）。部落祭儀有許多禁忌，一開始即排除女性參與，如同有些部落認為海祭讓女人看到會捕不到魚，布農族祭典也禁止女人靠近或觸摸獵具。部分傳統祭儀不僅不許部落女性參與，許多觀光客和媒體拍攝者在尊重部落文化的前提下，也不能參與儀式（孫嘉穗，2013）。

在文化禁忌與性別平等方面，陳金燕（2013）以台灣重要民俗文化資產為對象，檢視可能存在的性別歧視現象，包括女性在月經、懷孕與作月子期間常被排除於重要祭儀之外。她訪問保存團體代表和民俗學者，歸納出女性在這些期間被限制參加宮廟活動的三項理由：安全保護的考量、汙穢不淨的忌諱，以及陰陽對立。針對此不平等現象之調整，她提出下列建議：回歸特定民俗之歷史傳承與精神；回歸尊重神明的精神，讓信眾直接向神明請示；回歸活動所需之能力，不以性別為唯一門檻。

黃美英（2006: 5）指出，台灣原住民婦女是很「不一樣的女人」，論者需注意其族群差異、階級差異、城鄉差異和世代差異。

她並提問：同為女性，我們對原住民婦女有多少了解？原住民各族男性對同族或鄰族的女性有多少認知？台灣整體社會的眾多男性又如何看待原住民婦女？原住民新聞做為族群媒體，該如何呼應黃美英所提的族群和性別關注，在新聞中呈顯不同族群婦女的性別圖像與階級、城鄉和世代差異，這些都是各族語新聞尚待開發的新聞議題。

對於性別分工與禁忌，原住民族群各有不同規範。陳枝烈（2006: 27-28）研究排灣族經濟生產活動的性別分工，指出該族傳統是依體力耗費程度來分工。耕種與打獵是排灣族的兩項重要經濟生產活動，後者吃力且危險，一般由幾位男性族人一同上山，花費數天到一週，越過多座山頭去打獵。長久以來，女性不僅不可參與打獵活動，甚至在男性出發前都不能觸摸獵具，否則會打不到獵物。

陳枝烈（2006: 28）在探討性別因素如何影響排灣族公領域的參與時，強調階級對文化的影響遠超過性別：部落或家族有重大會議或事務，由各家族或部落掌權者，即出生序為老大者出席，若頭目是女性，即由女性來領導，另一部落頭目若是男性，則由男性來領導。祭司由男性擔任，負責五年祭或收穫祭的祭祀工作；巫師由女性擔任，在五年祭或收穫祭中與祭師分工合作，且另負責治病、祈福、消災與祭祀，重要性並不亞於男性祭師。

他說明排灣族的個人生命禮俗與部落歲時祭儀也呈顯其性別文化。男人祭時，要拿出男人的所有道具，女人要迴避；女人祭時，則拿出女人的全部道具，男人要迴避。青年會所只有男孩子能進入。男人祭的目的是培養男子氣概，出草打獵才有膽量；女人祭的目的是要解除禁忌。部落集體的儀式包含播種祭、除草祭、收穫祭、歲末祭、五年祭、出獵祭等歲時祭儀，大多由巫師或祭師主持，男女一起參

加，但部分程序只容許男性參與，如出獵祭時女性不能觸摸獵具、五年祭的勇士舞及刺球活動女性不能參與，孕婦更不可參加各種公開活動，以免影響胎兒的安全及健康（陳枝烈，2006: 36）。

這些部落禁忌都牽涉到女性記者所能進入的採訪場域，以及在製播原住民族群的特定議題時，同族與外族的文字及攝影記者必須尊重的部落規範與採訪倫理。如何在尊重部落傳統與顧及性別禁忌的文化場域採訪並製播新聞，反映出原住民記者在族群、性別和新聞專業要求間的折衝與協商。

上述種種涉及性別的禁忌與規範，不僅是記者須遵循的部落文化信仰，也可成為關於部落性別禁忌與日常慣習之報導題材——那是現有族群報導中較缺乏的部分；這些內容一方面可介紹部落傳統文化，另一方面也可協助外來者理解當地性別意識與習俗。

以達悟族為例，其飲食文化對食用者的性別與年齡，以及女人懷孕或產後的不同時期，都有嚴格規定，烹調和盛放食物的器皿也有區分，如女人魚盤不能裝男人魚或老人魚，因為這是不尊重家中的女人（台東縣政府，2008: 152）。呈顯達悟婦女心血的紡織技藝更有各種禁忌，如 Paneneb（Kapowan）月和 Papataw 月是飛魚期，期間盡量不織布，以免害男人捕不到飛魚而生氣；又如新製好的男人禮服不能給年輕女人縫，要交由老年婦女做（台東縣政府，2008: 117）。

原住民的性別禁忌也隨時代而轉變，林靜玉、楊仁煌（2012: 56）提到南勢阿美族歲時祭儀的捕魚祭，原本女人絕對禁止參加，然此禁令在科技時代也破解了，女性雖不能參與捕魚或網漁，但可到現場觀看捕魚的過程。不過，里漏與奇美等部落仍嚴格執行過去的習俗。

對於族群傳統與性別意識的堅持和轉化，不同部落有不同的進程與變貌，但在原住民族群意識高漲下，性別意識如何提升？堅持傳統

的同時，是否也應重新檢視禁忌在先民社會產生的原由，及其在當代社會的適切性？部分性別禁忌源於先民社會對女性的善意與保護，是基於良善的理由，但隨著時代變遷，女性身分角色與性別意識提升，這些禁忌是否仍合於目前處境？部落祭儀、公共事務與公共領域是否也該逐漸納入女性的意見與參與？這些問題有賴媒體從業人員透過議題性的報導與討論，尋求族人共識，也較可能在既有結構中，鬆動原有的性別權力關係。相關議題不僅需部落族人重新檢視性別禁忌，亦需對原住民新聞工作者進行性別培力。

（四）性別與文化翻譯

Lana F. Rakow 和 Laura A. Wackwitz 認為發聲涉及認同與代理機制，以及對壓迫和宰制權力關係的理解，故於討論「女性」和「發聲」時，需追問為何要發聲，代理機制和主體是發出誰的聲音，說了什麼。不同領域的女性主義學者都將發聲聚焦在語言、說話和故事。語言包含女性的語言選擇和認同，是產製意義的文化方式。說話包含女性在不同文化規範下的說話風格，以及沉默做為一種抵抗的傳播策略。女性主義學者從女性的故事中發現女性的經驗和嘗試，將女性的說話置入公共論述，並確認女性的發聲（Rakow and Wackwitz, 2004: 94）。

被問及如何展現原住民文化時，賽夏主播說她會讓耆老在鏡頭前說故事。在新聞中讓部落女性耆老說故事，又呈現了什麼特性呢？Gerald Friesen（2004: 4-5）以一位在電影中說故事的 93 歲加拿大女原住民為例，說明學生看著這位老祖母的影像、用心聽她說故事時，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她所描述的部落地方史。歷史的連結與傳承鑲嵌在

個人述說裡，就算她的故事並不特別具戲劇性，但仍非常有力，因為這樣的述說具有權威，能肯認原住民的自我意識和地方認同。原住民老祖母說著故事也帶來希望，因為她告訴兒子、孫女和一代代後輩，族人如何在過去存活，以及他們所經歷的悲歡歲月；這也帶給加拿大原住民光榮感，呈顯出加拿大各地原住民的獨立性。

Myra Macdonald (1995: 41) 描述女人經常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在文化形式中被定義該怎麼說，或該怎麼被述說；對許多女人而言，能夠發聲並被聽到，就成為重要的政治主體。

主播在述及女性部位或與性相關的內容時，因部落文化因素而不能直接以族語說出，或根本沒有對應的語彙，故常需轉換成委婉的敘述或描述方式。例如依太魯閣的語言慣習，無論男女都不能談論女性性器官或性生理方面的事，特別對男性來說，許多相關語彙都是禁忌，需透過族語中特有的委婉語來表達，像是以無花果象徵女性乳房，藉由形象與吸吮的動作來隱喻（連皓琦，2013: 51-91）。性別語言涉及部落知識的表述與傳達，在跨族群的閱聽眾間，常需借助語言以外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來詮釋，才能說明性別在特定族群中的文化知識。

Jenny Cheshire 和 Penelope Gardner-Chloros (1997: 249-277) 研究語言間的符碼轉換與性別差異，指出在不同社群中，男女性別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符碼轉換則承載著不同的內涵；而不同的社群也在符碼轉換間承載不同的社會意義。因其中變項太多，甚至還包含同社群裡的個人差異，故難以統整出性別差異在兩種語言的符碼轉換中的固定語言範型，及其所展現的社會特性。

Julia T. Wood (2006 / 董璐譯，2009: 113) 認為傳播除了直接改變文化，還與其他因素共同引起生活的變遷。如抗生素出現後，就必

須向那些認為感染是命中注定或偶然的醫藥工作者和老百姓解釋，使他們相信感染是細菌和病毒所致。同樣地，在使用借自其他文化的慣例後，也必須把它翻譯成這個社會的語言。文化也同樣需要定義和解釋，她舉例：火山爆發是地殼運動的結果，還是因為上帝發怒了？戰爭失敗是因為軍事力量薄弱，抑或動機不正確？一種文化如何定義及傳播特定事件，不僅決定了這些事件的含意，也深入影響未來的社會實踐和生活；性別的文化翻譯也在播報過程左右了部落對性別語彙的接受程度，並影響部落的社會生活實踐。

Iñaki Zabaleta 等學者（2010: 59）研究歐洲少數語言媒介之發展與知識，注意到少數語言媒介在處理技術性字彙和表達某些新聞議題上有困難。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統整新字，發掘正確但少用的詞彙，並提供少數族群將語言現代化和標準化的方式。這些努力——包含新聞室的討論、諮詢語言學者，以及製作新聞風格參考手冊等——使得新聞承載了重新發現語言的角色，但也製造了一些和閱聽眾的緊張關係，因為後者不一定全然了解新字或重新發現的字，標準化的形式也可能遠離原有的言說方式。

原住民主播的文化翻譯涉及多種面向：包括符碼的傳達，禁忌語和委婉語與部落文化社會脈絡之關係，以及創發族語中原來沒有的新字。性別與文化翻譯仍須回歸部落知識體系，輔以適切的詮釋，方能協助跨族群的閱聽眾理解性別、語言及其社會脈絡。

（五）原住民主播的性別培力

在尊重族群文化的前提下，原住民新聞工作者的性別意識與性別平權觀念尚待提升；原住民主播與記者的性別培力，可包含創設性別

平台、提供性別議題的課程與獎項、從女性觀點書寫新聞，以及在傳統性別空間中協商與創發新的書寫可能。

如何將婦女與性別運動的成果納入新聞，各國有不同的作法。曾任德國女性記者網絡主席的 Ulrike Helwerth 說，她希望給婦女一個平台，為女性所受的歧視和苦難發聲，也表達婦女的需求、成功與權力。她也透過女性記者聯盟資助性別議題的培力課程，培訓年輕記者，並提供獎項來鼓勵他們報導具性別意識的內容。印度的 Anjali Mathur 在 1983 年透過女性團體和媒體組織，讓女性記者討論性別相關議題，而後更形成政治壓力團體，關注婦女的勞動與薪資等議題 (Byerly and Ross, 2006: 135-136)。

美國在 1980 年代匯集種族和文化少數族群的專業團體，在主流媒體外凝聚影響力，並培訓年輕記者。婦女媒體聯盟 (Alliance for Women in Media) 等專業團體也在 2010 年力促性別平權。

Karlyn K. Campbell 和 Zornitsa D. Keremidchieva (2006: 190) 在討論性別表述類型與風格時，認為陰性風格可維持個人化的調性，透過個人經驗將閱聽眾視為同儕，藉以鼓勵他們參與及協助女性社會運動或訴求，促使閱聽眾成為社會改變的行動者。

Van Zoonen (2004: 148) 則指出性別和傳播主要是文化，文化關乎意義和價值的協商，涉及生活各層面，原住民記者的報導因此也在文化處遇和性別角色之間折衝。

在台灣，蔡佩含 (2015) 由文學的角度談論原住民山海書寫裡的性別／空間，以想像一個女獵人為切入點，指出文化是新／舊揉合的過程，在保留文化和書寫原鄉之際，應思考新的創作可能，而非複製一個原汁原味的傳統。她指出原鄉的重建需依賴文化敘事去填補，然而傳統部落空間裡的性別秩序，也被複製銘刻於這些文化敘事中，如

書寫祖靈信仰的禁忌與價值觀。她提出性別的勞動分工導致空間上的區隔，而形成男人的獵場／女人的家屋等傳統分配模式；她更質疑原住民文學在追回傳統的同時，難道只能複製現實世界裡的性別分工、並完全移植傳統結構嗎？她認為文化傳承不應只是如此。

原住民記者在採訪、書寫與播報的新聞場域，同樣面對性別文化空間的權力分配秩序，而須在其中協商與折衝，其性別培力同樣須強調在尊重傳統的同時，更應關注部落文化轉變中的性別處遇，並透過報導與書寫，促進部落性別平權的發展，由具性別意識的觀點與向度報導新聞。

三、研究方法

梁莉芳（2006: 50）在以 linahan 的阿美族女性為例，探論女性主體與知識建構時，指出女性主義批判實證研究與量化研究，並反思男性觀點所支配的社會科學，主張需發展關心女人、為女人說話的研究取向，重新發現被歷史壓抑的女性聲音，實踐以女性為主體、關懷女性的研究法。她引述夏曉鶯的說法，指出原住民文化近來雖漸受重視，原住民婦女也成為文化意象的主要承載者，但夏曉鶯擔憂原住民婦女的附屬、被動位置與僵化形象，更擔心她們成為各種慶典活動的煮飯婆與招待，僅提供具文化特色的歌舞表演（夏曉鶯，2001，轉引自梁莉芳，2006: 60）。梁莉芳（2006: 60）以原鄉的 ina（阿美族語，對媽媽輩的稱呼）展演文化的過程為例，說明婦女透過學習，在文化傳承外，從 linahan 部落「原鄉舞蹈團」的演出獲取生命養分及信心，並找到貼近生活經驗的意義與重要性。

當我們用上述焦點來檢視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呈顯與傳達時，需

探究原住民主播與記者是否在製播新聞時展現了女性的主體性？新聞是否只在表象上呈顯女性的歌舞表演，抑或對歌舞展演背後的女性生命史及其與族群文化的構連，做了相應的闡釋？這些貼近女性生活經驗的新聞呈現，是否深刻表露了原住民婦女在性別與族群議題中的特殊性？是否為女性日常生活經驗不同向度的展現？原住民慶典活動的炊煮工作，除了傳統性別分工外，也傳達許多部落知識，呈顯其飲食文化；祭儀進行期間，炊煮之處也常是性別禁忌場域，如賽夏族的矮靈祭，炊煮處不僅有性別限制，也有嚴謹規範。女性在擔任祭儀招待或活動演出者時，已婚與未婚女性即有不同的服飾裝扮（如卑南族），各族群的樂舞更展現出不同文化的性別和年齡階級。在樂舞的性別分工中，含蘊著深厚的族群知識，承載著由族群文化體現的身體展演。這些皆可成為新聞題材——由族群知識出發，藉著新聞推廣、流傳，以增進部落的性別文化知識。因此，原住民新聞工作者能否適切傳達與族群性別相關的文化知識，即反映出其製播族群新聞時是否具備性別意識，也檢證著記者是否帶著性別關懷與自身的性別經驗與受訪者及閱聽眾互動。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原民台 13 族「族語新聞」與「每日新聞」¹ 的主播與新聞工作者，透過第一手資料，理解原住民族群新聞在處理性別議題時，各族主播與記者所面對的性別差異、性別禁忌與性別再現等問題。受訪的主播有 12 位女性與 4 位男性，本文主要分析女性主播的播報經驗，輔以男性主播的經驗做說明。

原民台的新聞主播也須進行採訪工作，各族的文化脈絡有其對應性別議題的不同樣貌，本研究藉由主播與記者在採訪與播報過程中的

1 原住民新聞分為以族語發音的族語新聞，以及漢語發音的每日新聞。

性別處遇，探論其所需顧及的性別關切。

首先詢問各族主播與記者，該族的新聞為何多呈現男性身影，卻較少女性？繼而詢問性別角色在該族的社會、文化與禁忌有何特別之處，之後請對方說明曾經製播過的女性相關新聞，並解釋透過何種視角來呈現。訪談內容也針對新聞在性別與文化翻譯層次的不同面向，包含各族主播在產製新聞與採訪過程中，如何翻譯字詞與部落的文化社會知識；並於性別、階級等層面蒐集主播在採訪、製播和翻譯上遇到的問題。由探索族語主播們在日常實踐場域遭逢的狀況，整理出各種性別與文化翻譯相關案例，並尋求改善的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深度訪談的方式，於 2013 年 9-12 月間，針對新聞產製中的性別面向，訪問了原民台 13 族的族語主播。由於這些族群各有不同的文化社會脈絡，本文以各族案例對應其脈絡，分段分析主播產製新聞時的性別相關議題。另外，以族語發音的族語新聞與漢語發音的每日新聞，兩者在製播過程中有互譯內容的現象，故亦加入每日新聞主播兼新聞部副理 A（參見附錄一）的訪談。族語新聞的處理，不僅能凸顯和其他媒體報導的差異，及其在性別、文化翻譯與跨文化傳播上面臨的現象，也能呈顯不同文化和社會元素在新聞報導的性別場域所產生的問題與因應方式。性別議題雖涉及兩性各自面對的不同禁忌，但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處理女記者與女性禁忌的文化場域問題，男性新聞工作者在原住民新聞中面對的性別問題將另文書寫。

四、研究結果分析

性別差異在原住民各族有不同的展現，如阿美族為母系社會，噶

瑪蘭族女性也很重要，原住民新聞從業者在製播新聞時，都會處理到各族的性別相關議題，以下即依研究問題析論各族案例。

（一）性別新聞學

性別對於新聞產製的影響，首先體現在記者採訪的職務編派上。由於部落祭儀中有許多性別禁忌，若遇到女性記者無法進入的場域，原民台經常會以不同族的男女主播搭配採訪，如布農族男主播搭配賽夏族女主播，或噶瑪蘭族的女主播搭配男性攝影記者。有時因編派調度而只有女性主播前往，則會搭配當地男性族人進行採訪。

原民台的族語新聞主播因語言需求，多由該族的族語老師擔任。2013年9-12月受訪的主播當中，除了布農族、泰雅族、鄒族及邵族的四位「族語新聞」與「每日新聞」製作人為男性，其餘皆為女性。

在硬性與軟性新聞的取決上，原民台的女性主播多在訪談中展現偏好製作後者的傾向。達悟與阿美族主播都提到喜愛有人情趣味的新聞，並常讓女性人物在新聞中說故事。

如何製作承載部落知識又觸動人心的新聞呢？族語主播G說，原住民喜歡講故事，她也喜愛製作具故事性的人物新聞。她舉自己母親做檳榔花的新聞為例：

我做了母親做檳榔花很有故事性的新聞，媽媽因食道腫瘤留在醫院，化療不能吃檳榔，就把檳榔做成花，我拍攝媽媽時很有感觸，長這麼大沒聽過媽媽講自己的故事，我用族語呈現，我不敢太近怕會失控，拍完之後不敢碰。半年後媽媽的弟弟走了，做建築工從最高處掉下來，沒多久換金門的堂哥去世。我問媽媽為何

想做檳榔花，媽媽說她在想要留什麼給自己小孩，檳榔是很普通卻永不會凋謝的花，可以安撫心靈。(2013/11/22)

主播 G 後來做了一系列有關阿美族女性的新聞，包括介紹原住民服裝設計師結合部落傳統和服飾，以及用皮雕表達女人的韌性，試圖藉由新聞凸顯阿美族母性及存在價值。她提及豐年祭的衣服常是母親幫忙穿，也報導奇美部落的婦女在家整理衣服的景象。

媽媽很重要，我喜歡小小的觸動，有感動，想要報導與顯示平凡中的不平凡，與簡單中的不簡單，從細微處找到大作為，能夠感動自己和別人。在都會常會忘記自己，我想用新聞報導找回部落的真性情。媽媽說阿美族的土地就是母親，是大地之母，所以我也常會報導土地議題，從美麗灣到大港口和阿美族土地建劇場的議題都是關注的焦點，我都讓部落的人講他和土地的關係，以及和這些議題相關的故事。(2013/11/22)

達悟族主播 E 更直接說自己不喜歡政治而偏好人情趣味的新聞，呼應 G 報導女性藝術家、媽媽和家庭相關議題。女性的族語主播在議題選取上，的確傾向較個人化與能夠感動人心的新聞。

主播 A 表示，原民台做過排灣女頭目、祭司、巫師等議題，也做過許多與其婚姻相關的議題，如女頭目嫁給非頭目階級的男性。新聞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介紹頭目文化的傳承，以及當她嫁給漢人時，面對現代社會轉化，要如何繼承家產等問題。也有介紹阿美族的社會，如祭司就是很重要的議題，各族的祭司都和性別相關，有許多題材可作，如祭歌或占卜。有時不一定強調祭司的女性身分，但因她是

承載者，又剛好是女性，所以就從文化脈絡和女性觀點來做，且通常由保存文化的角度來製作。

部分學者論及硬性與軟性新聞時，認為女性記者導致後者增加，或女記者也須爭取報導政經等主流新聞，以便與男記者競逐專業地位和升遷機會。他們常貶低軟性新聞的重要性，將它構連到女性特質，很少從正向角度看待這些特質或與母職相關之人性報導。這種分類方式，與認為硬性新聞較專業的看法，皆隱含男性的權力觀點。而原民台的女性記者，卻是在報導重要的女性角色與日常實踐中，以貼近原住民生活的文化情境，呈現部落女性的強韌與文化特性，紀錄其如何在新舊雜揉的社會變遷中展現生命，透過具性別向度的新聞視角，展現各族群多元的性別圖像。由此可見，軟性新聞能深入探討性別議題，呈顯不同特質的專業，更真切地呈現部落精神與生活狀態，凸顯深刻的文化底蘊。

（二）原住民族性別禁忌

對於部落面臨現代化而導致傳統流失的危機，原住民記者多懷有保存部落文化的使命感，因而在性別處遇上，顯現出尊重傳統先於性別角色的考量；女性記者對於無法進入祭儀與性別空間，大多表示願意遵循部落傳統。然而如文獻回顧中的討論，族人婦女雖常以原住民的認同為優先，卻也想用女人自己的話來陳述女人自己的生命經驗。

檢視此立場時，一方面應避免殖民式地移植西方理論來框限原住民知識中的性別理解——這可能成為一種性別詮釋暴力，亦即脫離在地的社會與文化脈絡，而將西方理論強加其上；那些不符合西方主流性別論述的案例，也不該完全歸因於原住民女性新聞從業者欠缺性別

意識。但另一方面也應對下述情況有所警覺：一味沿用傳統慣習，而忽略其中可能隱含的性別不平等；部落慣習未能因應社會變遷，致使世代差異下的女性覺醒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未能正視女性參與部落公共領域及其他涉及性別平權的議題。

1. 性別議題所產生的問題

部落的性別分工、公共事務多由男人參與，以及女性因性別而被禁絕於文化祭儀之外，這些傳統是否皆應視為對女性的歧視？答案可能因外部觀點與部落視角的差異而有不同。為何部落中的許多女性不認為這是歧視？是因為部落女人內化了世代性別壓迫而不自知？抑或在尊重與復振傳統的旗幟下，性別平權的訴求被壓抑？還是藉保護之名讓女人失聲的過程隱而未見？這些都是可能的理由，但也可能是原住民女性和其他女性主義者產生歧異之處。西方女性主義者的理論、關切和主張，以及高社經地位女性權益的爭取，套用在原住民部落的社會文化脈絡與多數女性目前的社經處境上，都會使不一樣的女人呈現不同的觀點，也可能在不同的軸線上對話。如何進入部落的脈絡思考相關問題與產製新聞議題，並協助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兼顧性別平權、專業尊重與文化傳承，遂成為討論性別、族群與媒體的重要課題。

原住民的許多禁忌都和性別有關，如大船下水時女人不能靠近，男人的獵具不能碰觸，孕婦不能進祭場，甚至孕婦的丈夫也不能進入祭場等，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不少人會視之為對女性的歧視，然而從部落的視角觀之，許多族人會認為是遵循文化傳統的重要儀式，故須以祖先傳下來的方式進行。本文所訪問的記者多屬後者，在性別視角和族群觀點之間，多以保存文化為優先考量，而不認為是歧視女性。

只有一位排灣族的主播認為，在現代社會，女主播應和男性一樣可進入傳統場域採訪，不應有性別差異；但她也會在部落受到許多耆老的壓力，認為如此便沒有遵從部落的規範。性別議題如何影響新聞的產製？如大船下水或找造船木材等僅限男性參與的活動，達悟女性要如何採訪？當題材本身就對男女記者施以差別限制時，女記者及主播要如何採訪其無法進入場域的新聞？還有許多具族群特殊性的議題，如排灣女頭目、噶瑪蘭女祭司、泰雅巫醫和紋面師傅，以及阿美族巫師等，也都與性別相關。男、女記者皆各有無法進入的場域，因此部落禁忌與性別分工在許多層面上影響了原住民新聞的產製。

2. 新聞工作者的因應方式與無法解決的難題

本文訪談身兼阿美族每日新聞主播與新聞部副理的 A，探究如何在現場處理性別禁忌，以及族群新聞的職務編派與性別的關係。A 從主管編派工作與主播採訪、製播新聞的不同面向，說明性別、族群與媒體的現況。她表示身在原住民媒體，的確常遇到性別禁忌，通常表現於兩種情況：一是決定某個採訪行程要不要派給女性，二是在女性遭到不當待遇時該如何批判。她就親身經驗說明：

先講前者，長久以來因自己是原住民，我們比較少遇到去到現場才知道，啊，那是女人不能去的地方，所以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採訪之前或者記者想去一個行程去和主管討論時，我們就會考慮進去，如果那是一個女人不能去的地方，那我們就會派男記者去，又或者說我們的確人力很不足，人力不足時我們真的需要寫稿是女生的時候，尤其台灣的媒體圈攝影都比較像勞動苦力的感覺，畢竟主導主要是文字，是女生，所以也會有一種方式就是還

是兩個人一起去，但是去到那個現場譬如說大獵祭好了，卑南族 12 月的大獵祭的時候女人就不能進場，所謂不能進場就是不能跟著他們上山去狩獵，所以男人做了很多的儀式，如祈福、驅邪和狩獵前的訓練，或過夜這種體能的操練，理論上女生是拍不到，但我們就會請男生的攝影師，單機就跟著上去，這個是長久以來我們自己處理的方式。(2013/10/25)

只有女性記者去時，A 表示會尊重該族群的禁忌，例如她自己在的部落、台東玉里樂合社區 halawan 豐年祭的最後一天，有個叫 mafanaw 的送靈儀式。祭典第一天會迎靈，最後一天要送靈，只有男性才能送靈，女人絕對必須退場，而且除頭目外，圓圈裡面不能有人，即使連男記者也不能進圓圈。A 表示以拍新聞、紀錄片或節目的角度來說，從頭到尾都對著背面，畫面一定不會好看，但那時主播和記者就不能只顧新聞專業的美學標準。她解釋在這種時候不會一直去說服頭目，無論是拜託、給錢、或表明原民台的身分，請頭目讓她們拍；原住民記者不該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採訪，過去主播 A 和其他記者的經驗，大概就是以尊重部落的方式來對應。

阿美族海祭也同樣禁止女人進入，那麼女性記者要如何進行採訪？

海祭的部分女性就是扮演慰勞男性的角色，通常就是一定在海岸上吆喝加油或用舞蹈鼓勵他們，或者就帶食物、水、酒到海邊慰勞男性，女性的角色在海祭主要是這樣。女性記者能拍的也都是岸上的活動，男人才能跟著竹筏出海拍到那些東西，因為阿美族社會對男女的社會規範就是井然有序，禁忌一旦打破老人家是

很忌諱的，現代年輕人對禁忌規範很淡薄，但女人一旦碰了相關器物，老人家會擔心男人出海會翻船什麼的。(2013/10/25)

雖然原民台的立場是尊重原住民社會規範，但在當代男女平權概念的影響下，年輕一輩可能逐漸會有不同主張，原住民記者在顧慮部落耆老觀點時，又該如何面對女性年輕世代的要求？主播 A 舉了發生在阿里山鄒族與阿美族太巴塢部落的案例，說明目前新聞的處理方式：

我想到兩個例子，在新聞的寫作上我們會像個外來者去報導它內部的爭議，我舉例來說，阿里山鄒族的 kuba 也就是鄒族的男子聚會所，在古老的時候，一直到現在也是只有男人能進去，那是一個男人討論戰事、儀式或整個祭典今年由哪一家來進行的地方，也就是公領域的進行都是在那個地方討論。鄒族很有趣，就有一個女性主義者，她也是學者 Abu，她曾經是高雄市原民會的主委，她就曾經要求說時代已經改變了，這種公共事務的討論女性應該要加入，她那個時候是被男性批評。那我們在報導這個的時候，我不會涉入，即便我是鄒族的記者我都不會涉入，我就會報導一個鄒族的集會女性提出應該納入女性的參與，就是用這種中規中矩的方式來報導，我們一定會報導，不會迴避，但通常是用這種方式。(2013/10/26)

發生在花蓮光復鄉太巴塢部落的情況，則是年輕女性爭取參與豐年祭，牽涉到性別與年齡階級的問題：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只有男性才有年齡階級，可是今年太巴塢的女性說也想加入年齡階級，部落裡面就完全兩派不同的意見，我感覺上大部分的聲音是反對的。即便阿美族是一個母系的社會，但年齡階級和豐年祭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祭典，大部分的人是不能參與的。那面對現代化男女平權的概念，和這樣的事件發生在部落裡，我們能採取的報導也是像我剛說鄒族的那個案例一樣，我們會去面對它，報導它，呈現兩造的意見，但我們也很難進一步去詮釋它。(2013/10/26)

由訪談案例可看出，原住民在性別場域的禁忌與傳統分工，的確會對女記者產生不同層次的影響。較具性別意識的女記者試圖打破禁忌時，可能會遭受來自部落男性長輩或耆老的阻力，同時也須背負破壞傳統的壓力，因而在嘗試過後，可能選擇較迂迴的方式，如透過家中父兄在部落的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看法，或以臉書等新科技媒介陳述己見；這麼做既可尊重老人，避免在傳統領域衝撞部落既有體制，又可在網路等現代公共領域另闢戰場，以記者的專業角色發聲。部落性別平權的落實不僅在於原住民女性的覺醒，更需要男性因應當代社會轉變，正視女性的投入與參與，並重新思考傳統文化慣習與性別尊重的平衡發展。

你要問的如果是我，我會說我會完全尊重傳統，我是這樣的人，不同記者可能不一樣，我覺得傳統是珍貴的，我不去參加公共事務的討論，不表示我在公領域毫無發揮的空間，尤其像我這樣的人，講白了我在漢人的都市裡打拼，難道我拿的麥克風不是我的武器嗎？我的臉書，我參與的社群網站，那也是另一種公領域，

所以我會覺得我不必然一定要去迎戰或挑戰傳統上大家認為公領域的空間，例如說男人的集會所。如果是我個人我反而覺得很古老的井然有序的原住民社會，另有一種美在裡面。我們所有的一切都要消失了，包含語言啊、我們傳統的衣服也是一年只有在豐年祭的時候才穿一次，什麼都在流失了，如果是我，我並不想看到它流失。而我想在公領域或公共事務發表意見我有很多管道啊，我也可在爸爸回家時，我就在家裡跟他講，我跟我家的男人說服，要他們回到公領域的時候表達意見，不用一定要去對抗，有時女人出現他們真的會很不高興，那是沒有經過那個背景的人很難去想像的。(2013/10/26)

身為當代的原住民女性記者，不論是以影像或聲音為媒介，在新聞專業、族群慣習與性別禁忌間，可能遇到什麼樣的問題？主播 A 說明：

舉例來說我今年就曾嘗試去做打破禁忌的事，上個月紐西蘭一組做原住民節目的製作人、攝影師和主持人三人一組來台灣要拍都市原住民，其中一個活動是到中和參加都市原住民的豐年祭。他們希望我帶著他們跳舞來拍攝，我剛開始帶著他們跳第二圈，第一圈都是男人如頭目，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都市裡大多是這樣，有時還會有政治人物在第一圈，我剛開始帶著他們跳第二圈，我希望他們可以看著前面人的腳步學，他學了幾分鐘就跟上腳步。我知道在內圈時，攝影才能拍到好畫面，因為不用卡著中間還一圈人，我就帶他插入第一圈，那天的祭典不是真正的豐年祭，都市的豐年祭通常社交的成分較多，我也才敢帶他進入第一

圈，跳了一兩圈後，人越來越多後，就有人跳過我直接牽他的手，把我擠到後面來，我主要是要讓攝影師有較好的畫面可以拍，但牽手時就有人會把我們擠回第二圈，我就意識到第一圈的都是男人，只有我是女人，雖然頭目在一開始有特別介紹我是原民台來的，有說明今天有紐西蘭的貴賓及他們要拍什麼，我以為他們會容忍，尤其這也不是什麼祭典，比較像是迎賓的大會，就沒想到第一圈還是完全不能容許有女性，把我們退回來第二圈。這種時候我就不會去說服頭目說他們有節目需要，還是外國人等等，我也跟那個製作人解釋說我們可能還是要守規矩一下。
(2013/10/26)

就新聞專業而言，近年來大量女性工作者投入相關領域，也有極佳表現，A 即是女性擔任新聞機構主管的案例。但為了尊重傳統，當無法進入所需採訪的場域時，女性新聞工作者如何思考和因應呢？而且，因為攝影與掌鏡者多是男性，導致某些影像會以男性的視角來呈顯，A 對此的看法如下：

我完全不會覺得斷手斷腳或有殘缺感，除非那個新聞真的侵入到阿美族的公共利益，我必須要突破這些框架，否則若是這些地點的文化性或教育性節目，我還是選擇不要打破禁忌。技術面的處理方式我可找男生去拍，或者找可以拍的人去拍。某部分的確是呈顯了男性的視角，我能做的事是從外部觀點來做觀察，但在我們的規範裡，這是我會選擇做的事，比如說做圓圈外面的女人。豐年祭時女性也很活躍，男人忙碌一天後總會回來聚餐，阿美族豐年祭時姊妹也常一起烹煮、聊天，每個部落女人可以跳舞的時

間不一定，我們部落是晚上女人才可以進場跳舞，所以到晚上就會看到女人著裝。我就會覺得那些話題如女人在廚房裡的工作，女人如何打扮要進場跳舞的那些細節，其實那些都有很多新聞題材可以做，或女人怎麼看男性的祭典。(2013/10/26)

被問到以前有做過相關議題的新聞嗎？A 遲疑了一下才說：「耶……好像比較少，我現在一直想不起來，要找一下。」印象中，新聞影像比較少看到女人，祭典焦點多在男性，但 A 也表示其實要看部落，有些部落的迎靈和送靈是由女人來進行。比如港口部落，她解釋以她所屬的阿美族部落來說，雖然女人在晚上才能活動，但晚上女人是主角：

例如領唱，因為女生的加入會使整天的活動變得較柔，男人會開始放鬆，整個的氣氛是很活潑的，會互相調侃，女人也會消遣男人，在那邊女人的空間是蠻大的。也有台東的部落迎靈、送靈是女人為主，男人那時在旁倒酒給女人喝，就是服侍女性。阿美族算是女性在祭典相對出現比較多的。我倒是覺得有些和男女無關，有些圓圈你就是不能進去，即便是女人的送靈或迎靈，有時圓圈一圍起來，不論男女攝影師都不能進去，有時性別不是這麼重要，而是那個儀式的禁忌本身就是不能有任何人在裡面的。(2013/10/26)

這段話也說明在新聞處理上，性別有時只是影響記者進入場域的部分因素，族群禁忌本身含有多層次的部落規範，有時也不分男女。A 提到曾做過阿美族巫師的新聞，說明兼具部落文化和性別特殊性的

案例。面對時代變遷，巫師也需家人的包容來適應社會轉換的處境：

阿美族的巫師須付出很多代價，我印象中我們有做過，包括她們的飲食，她們絕對不能吃奶類的東西。她的婚姻也會被影響，她是巫師的話，她的家人必須要很包容她。我的外曾祖母就是巫師，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輩都有講，這個我們有做過，就是她擁有和靈界溝通的能力，她又必須幫人治病，所以巫師承載了很多人的痛苦，所以我的阿祖，也就是她的伴侶和她的孩子必須要能容忍，孩子要能容忍媽媽幫人做法時，整個會像魔鬼一樣，披頭散髮，身體扭曲，面目改變，就你可以想像的樣子。我的祖母和姨婆，她們不想要看到自己的媽媽是那個樣子，覺得媽媽好奇怪，部落需要巫師，可是她身邊的人面對現代化時，古老時不會覺得媽媽有什麼問題，她應該是要被尊重的，可是到我的祖母這一代，日本人來了，受到日治的影響，以及後來的漢化教育，就會覺得那樣一點都不優雅，就覺得怎麼會那個樣子，怎麼不穿鞋。開始被約束時，到現在年輕人吃什麼，可是巫師可能被約束很多東西不可以吃，如不可吃蔥什麼的，飲食上有很多的禁忌，生活的規範和人不一樣，這我們有做過相關新聞。(2013/10/26)

A 也舉近期做的新聞，說明年輕人開班授課，用非常現代化的方式承襲傳統：

我們近期也做過很年輕的祭司，因為那個是藥學系，要傳承，她們甚至有開班授課，而且只能傳給女性，排灣族的有。就是有很年輕的，這是我們台東記者採訪的，很有趣，她完全現代化，你

也看不出來，還帶著金框眼鏡，平常要去學校上課那種，就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人要把她拉回傳統的情況。阿美族認為家族會傳給一個，如曾祖母傳給下一輩，就是這一家是被允許擁有那種能力的家庭，會代代相傳。(2013/10/26)

訪談資料顯示原住民知識體系中，不僅有嚴格的部落性別禁忌，也有許多植基於性別特殊性的角色，如承接傳統知識的女祭司；隨著社會價值轉變，年輕的部落女性該如何傳承部落知識，同時在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轉換身分？這些都是原住民新聞紀錄部落女人與社會變遷的精采題材。然而在紀錄族群視角時，如何從性別的觀點再現與詮釋部落女性的生命圖像？這應是現職新聞工作者在保護原住民文化資產之外，可著力於產製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之處。

3. 原住民工作者對於性別議題報導的看法

台灣原住民族包含許多不同族群，各族新聞產製所涉及的性別禁忌殊異，也各有不同的文化脈絡，本文經由訪談，整理出各族主播與記者對性別議題報導的不同提醒與看法。

族語主播 J 說明噶瑪蘭約剩一千多人，是以女性為主的族群，在性別禁忌方面，有許多男性無法進入的祭儀場域。女祭司在除瘟祭的部落祭典、亡魂祭的家祭與請宴祭中擔任主要角色，只有海祭和入屋由男性耆老擔綱，但男祭司若喪妻也無法參與，女性則不能參與蓋木屋，通常由八、九十歲的耆老守夜。女祭司負責治病和除瘟疫，男巫師則在有人碰到不該碰的東西時，幫族人解決問題。除了女祭司的血統，部落祭儀還有嚴格的禁忌規範，平常不能紀錄或拍攝，如要拍攝相關新聞，須經頭目同意，由政府單位出具公文說明需求，透過表演

的形式來介紹並傳承文化。她拍過「噶瑪蘭的祭祖儀式」，但只播出片段，部分是怕失傳，所以拍下來留給家族的人看，但不能公開播放。

J 做專題時會強調女性的意象，找女性為主的題材來做，例如報導女性較多的發展協會，或是婦女教導傳唱、織布、舞蹈等活動。在噶瑪蘭族，男主播不能採訪女祭司，當 J 遇到類似的性別問題時，會先和攝影溝通要何畫面，或找熟悉祭典的部落人士帶領可進入祭儀的人去拍。如需海祭畫面時，要先說明重點在哪，意義才能精準。

族語主播 K 說明在採訪太魯閣族時，須注意許多性別禁忌：入山儀式女人不能碰獵具，慶典時女人在家不能參加。性別的區隔還包含工藝，如太魯閣族的背網一般只有男性會做。進行儀式時，文字和攝影記者都不能過去，一定要拍攝的話，只能在儀式後用演出的方式紀錄，因為不能讓攝影干擾祖靈。

族語主播 E 談到，在觀光與商業利益驅使下，性別禁忌也出現許多轉變，例如蘭嶼的部落竟然開放讓女性觀光客上船體驗，這對部落而言是破壞文化傳統與禁忌的行為，令她非常驚訝。

近年來，許多部落傳統皆面臨商業因素帶來的衝擊，而有折衝與妥協的各種作法，其中當然也包含性別禁忌與觀光需求之間的衝突：達悟人嚴守女性不能碰觸船與不能上船的禁忌，部落以觀光體驗之名讓女性上船，在族人間也引發不同意見的討論。原住民對傳統禁忌的遵循，含有深層文化底蘊的生命信仰與部落規範，當禁忌被破壞或轉變時，族人會試圖以各種說法來消弭心中的不安，如解釋上船的是外來者，不是傳統部落設定的人。新聞製播過程中，身為中介者的原住民記者與主播，在呈顯或再現與性別禁忌相關的內容時，也常會依其族群身分，從部落觀點來呈現，其詮釋與報導的性別向度猶待加強。

然而倡議性別意識是否一定要透過衝撞傳統的方式？新聞紀錄可以同時是文化省思，性別觀點仍可從部落的脈絡來理解。就目前的採訪與播報實務而言，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在族群意識之外，尚可加強性別意識的培力，持續關注部落社會的轉變、性別議題的辯證，並在相關議題中探討部落性別意識的變貌。

族語主播 D 認為，採訪時除了要注意性別禁忌，還要考量排灣階級的重大因素，以決定能否採訪到所需的新聞。原民台新聞需採訪及拍攝排灣族頭目傳承之琉璃珠，但頭目在採訪過程中告訴 D，因為她不是頭目階級，所以不能讓她拍攝琉璃珠。後來她連繫亦屬頭目階級的丈夫，由丈夫致電該頭目，頭目才願意提供家族特有的琉璃珠供原民台拍攝。由此可見排灣文化中影響新聞製作的不僅是性別，還有階級因素（孫嘉穗，2014）。

阿美族族語主播 G 說明該族是母系社會，採訪時要注意許多禁忌，如採訪巫師儀式，哪些不能吃、不能帶都要先請教；像生薑、蒜、雞等不能吃，不遵守則會不舒服。採訪前巫師要做驅趕儀式及用祝福的水，採訪時要先溝通，紀錄過程須尊重部落要求，不能攝影的就不勉強，用遠遠拍外景、口述或後訪等方式彌補因女性禁忌無法拍攝的畫面或祭儀。

男性族語主播 H 述及泰雅為父系社會，在生活習慣上，女性不能摸獵具，活動祭儀仍以男性為主。泰雅的巫醫和紋面師傅多為女性，有儀式，但很多都失傳了，女性紋面的意義是成為真正的女人，有生育能力，會編織，可度過痛苦，抵抗力強，可克服以前有的破傷風。編織是由媽媽們採收苧麻來進行，其技巧及圖騰最具傳統意義。

部落的性別議題與性別禁忌應置於該族群的文化脈絡中檢視，避免單從西方視角或外來的女性主義觀點，視之為對女性的歧視。在族

群的大傘下持續反思部落的性別議題，且在採訪與播報場域不斷統整面對部落禁忌的案例，進行溝通與調整，這應是原住民新聞工作者提升性別意識與進行性別培力的重點所在。

（三）性別的文化翻譯

原住民記者在產製新聞時，不僅要進入自己的族群脈絡理解相關性別禁忌，也需理解其他族群的性別議題，以便在跨族群採訪或翻譯新聞時，進行正確的文化翻譯，不致觸犯當地的性別禁忌。

原住民新聞播報性別議題時，雖有性別用字，但因部落文化而不能直說，需以替代方式說明；此外，當醫療資訊涉及性別用語時該如何說明，也常令主播們困擾。

族語主播 C 表示，新聞播報中常出現的情況是，播報得太過直白，老人家覺得不雅不能接受，但描述得不清楚，年輕族群又覺得資訊不夠明白，無法傳達必要的訊息。比如多族皆不能提到胸部或乳房，致使乳癌防治的相關新聞變得很難播報。女性身體的描述涉及部落的性別禁忌與性別想像，新聞播報是條迂迴的路徑，由應該播報，到不能播報，到透過隱晦的方式播報，以及部落異質的閱聽眾接受與否，都促成說明性別身體時的迂迴取向。

採訪結果顯示，各族女主播在播報族語新聞時，常面對性別身體難於表述的問題。男性族語主播 C 更直言，許多女主播因為不論怎麼翻譯都會受到族人責難，故常拒絕翻譯相關新聞，或從一開始就不挑性別相關的新聞，致使許多應讓族人知曉的資訊沒被播報。

族語主播 J 報導乳癌防治時用日語，報導性交時會說男女二人睡在一起，把「強暴」的新聞說成強迫跟他睡，通常都用較婉轉的

說法。男性族語主播 H 表示，泰雅語中有些詞有文雅的说法，有的是禁忌，如不說上廁所，而說我要到外面去（tanux），或說我去看天（mita kayal）；女子懷孕不能說肚子大，而要說負重的，分娩不能說生了，而說在家了。族語主播 I 說明祖靈祭時會特別介紹女人的重要，因為在廚房，功臣是女人。I 播報乳癌新聞時說乳房發現異常狀態，要快看醫生。她表示播報性相關的新聞很困難，老人家會說不要這樣講，如性愛、性交或青少年的性問題，都只能形容女孩子的禁忌部位，不能說太白；部落較保守，常用借用語，如男性的特定性器官就講氣球，老人家常說聽了會不好意思，所以有些報導就會用抓來抓去、兩人摸來摸去的地方來表述性相關用字。

如果文化傳承是原民台的重要使命，那麼與性別相關的各族語彙如何在新聞中傳承？語言植基於性別文化之上，如何透過語言來表達、轉譯、構連社會網絡？主播又如何中介並構連社會網絡？這些都是新聞中的文化翻譯需關切之處。

主播 A 表示，許多古老祭典用族語，即便拍攝的是男性，但若不懂該族的族語，就只有影像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會有問題，所以通常會找該族男性攝影去拍。人力不足時，如拍撒奇萊雅的火神祭，沒有該族攝影，可能請阿美或泰雅男性去拍，但需請當地人帶他進入並翻譯，那個詮釋包含性別的、族語的詮釋，通常由攝影記者執筆，但大多請該族男性協助。

性別翻譯涉及女性在發聲過程中面臨的各種處境，以及用委婉語替換禁忌語的播報方式。各族主播的文化翻譯培力，應加強呈現難於表述的性別語言，並創發新字做為播報語言，不能因為難表述就不持續發聲。播報過程中也須適切地詮釋性別表述在特定族群的文化意涵，以協助跨族群的閱聽眾理解。

(四) 原住民主播與記者的性別培力

依據訪談結果分析，現職的原住民記者對於族群意識和性別觀點的關注，常會因保存傳統的強烈使命感，而較忽略性別意識，但這並不表示記者不關注後者。訪談過程中，賽夏族的族語主播 B 表示很高興能參與，發現之前從未由此角度思考，如今重新關注性別意識，也仔細反省部落中的傳統性別角色與現況，之後會多從性別角度報導相關新聞。原住民新聞工作者的性別培力格外重要，因為同樣的議題由性別或族群的視角關注，將展現不同的面向。部落性別意識的轉變非一蹴可幾，需長久的倡議、辯證、協商，並因應當代社會的價值變貌進行調適，與時俱進。新聞產製不僅可讓具性別意識的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從族人的角度觀看與發聲，也可透過新聞的敘事、討論及辯證，逐步從不同視角紀錄、報導部落禁忌的調適與轉變。部落的性別議題當然會與既有性別權力結構密切相關，記者試圖鬆動原有的性別分工與部落架構時，經常得面對權力結構的壓力，因此透過書寫與影像紀錄，倡議並提升部落的性別意識，是原住民主播與記者在促進性別平權上可著力之處。此外，部落的性別平權有賴於兩性的共同覺醒與努力，方可能轉變既有的性別權力結構。男、女性原住民新聞工作者應同時增進性別培力，方能理解不同性別在各族群部落的多樣性別處遇。

性別培力的對象不只是女性新聞工作者，因為部落不僅有限制女性進入的場域，也有限制男性的場域。此外，性別平權的培力不能僅在女性，更需相互合作的男性記者、族人與部落社會共同體認性別平權的意義。

女性主播的性別培力，在國外有關於家暴、性別處遇等報導；女

性主義與原住民的論述和案例中，更有部落女性領導者培力、女性平權法律的宣導。部落新聞在推廣性別平權時，可著力於當代部落社會對傳統分工、性別角色與權力分配之思考。

訓練有性別意識的記者與主播，是原民台在製作新聞時應加強的工作。如果青少年能藉由原住民新聞貼近部落文化與知識，從中接收傳承，那麼青少年與年輕一輩的女性原住民，又如何從新聞中接收有關女性的部落知識呢？排灣族的女頭目在部落的階級與傳承外，能否經由排灣新聞中的相關報導，了解其他部落的女頭目如何因應現代社會衝擊，以及在傳承部落文化知識時，如何以當代視角帶領部落。這些都是原住民新聞應致力探索並呈現的文化顯影。

新聞部副理兼每日新聞主播 A 談到訓練記者：出發採訪前，通常會先說明注意事項，若有女人不能進去的場合，也要先溝通；採訪過程中難免犯錯，有人反映或抱怨時，就從錯中學，比如部落協會理事長曾打電話抱怨原民台記者，她只能盯著記者不再犯。她也舉例說明部落和新聞工作者都須學習適應媒體進入部落的情況：

在訓練記者時，一開始就知道什麼部落哪些是女人不能進去的要先了解，有了採訪倫理準則，部落較不會被干擾。一個族至少一個重要案例，記者會知道哪些要注意。比較明顯的是地點，如某一些圓圈不能去。部落也在成長，我自己的部落離安通溫泉和六十旦山近，遊客很多，有一天我從家中走出來就有兩個小女孩很驚喜地問我可不可以和我照相，我原以為我是主播他們才要跟我照，後來我才知道她們當我是活道具，我是後來照完後才知原來她們看到穿奇裝異服的人，這是一個，部落的人要認知隨便有人走過我家前面要拍我就可以拍我，部落人的權利在哪裡，這是

一個要思考的問題。另外就是進入祭場的時候，我的部落里長和頭目還沒意識到這部分，只有年輕人意識到，年輕人就做了一個看板放在場邊，幾點到幾點攝影機不能進入，可是不是很醒目，就有很多觀光客在圍大圓圈時跑到內圈因為拍攝角度會較好，里長就走過來問我說不可叫他們不要拍，我就知道里長不舒服，會有被觀看的感覺，他可能講不出來，沒有理論，但可感受到，我說可以告訴他們要先退場，等到我們快結束時頭目再開放何時可進來，他也沒經驗，就用很兇的口氣把觀光客逼出場外，其實觀光客也會很錯愕，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是個禁忌，所以很尷尬。部落也在成長及學習，有些覺得是禁忌，一方面新聞工作者要學習，另一方面內部也要學習。(2013/10/26)

A 也說明了一些細微處，如阿美族女性一穿起族服，觀光客就會當寶一直照相，但據她觀察，有時這是在常受歧視的環境下感受到自尊的表現：

可能瞬間會覺得自己被重視，而感受這是我有的而你沒有的那種成為明星般的感覺，這是我的觀察。跳舞時聊天會說那個白浪加進來跟不上，好像在那個時候會覺得自己才是優勢者與在高位的人的感覺，但其實是長久以來的一直被貶抑、歧視，被稱為番的那種自卑造成的，這是我自己的觀察。也是不是這樣老人家也不排斥自己是被閃光燈照相，因為女生喜歡進去跳舞，我們喜歡自娛，我們喜歡那種團結，另場外有觀光客要來照相時也會覺得自己是受重視的，被漢人當成寶。老人常說我們要傳承文化，但傳承是人家侵入你的祭場嗎？年輕人開始反省了。(2013/10/26)

原住民主播和記者應與部落相互培力，從日常實踐的採訪過程理解部落倫理規範。各族主播也應分享採訪和性別文化翻譯的經驗，就語彙、播報語言的使用，以及尊重部落禁忌等方面進行交流。

在跨族群的性別意識增能上，原民台記者可藉由定期的內部交流與討論，針對性別議題檢討既有報導須強化的部分，也可每次邀請一名族群記者或部落人士，介紹該族相關性別議題，並討論面對性別禁忌時，部落和記者在遵循傳統之外，如何產製出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

原住民主播與記者的性別培力應同時對兩性進行。在轉變既有結構對部落女性造成的處遇，並思考原住民新聞工作者如何處理性別相關的產製流程時，宜匯整各族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問題，共同討論協商，形成更大的集體力量，以免讓女性或男性工作者獨自在工作環境中衝撞部落既有體制而承受極大壓力，並共同提升性別意識，產製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

五、結論

研究訪談顯示，原住民記者多認為應增加性別議題的相關報導，並以更具性別意識的視角來製作原住民新聞。軟性新聞呈顯了貼近居民生命的視角，反而更能有力地探觸部落的生活基調，以觸動人心的方式展現人物特色。在原住民記者的性別培訓上，宜檢視各族限制男、女性進入性別禁忌場域的文化禮俗，並擬定採訪規範，在尊重部落傳統的前提下，致力提升性別意識。除了媒體單位，部落也應思考：許多禁忌源於傳統社會的性別分工，然隨時代變遷，現代社會的分工模式已造成部落的轉變，在此情況下，是否應重新檢視某些性別

禁忌，並促進性別平權在部落的落實？記者或可透過性別議題的規劃，逐步提升部落的性別意識，消弭採訪時進入性別禁忌場域的問題。

面對部落傳統的流失，包含記者在內的許多族人，常會以維護祭儀與保存文化為優先，視之為自己對部落的職責與使命。在族群意識的框架下，性別意識的覺醒可能會被壓抑，或在維護傳統的各種名義下被忽略。然而族群與性別皆為文化的重要向度，皆須檢證各種權力關係，抵抗不同形式的壓迫。因此在維護原住民文化時，記者不僅要追尋個人的族群身分與認同，亦須檢視自己是否帶著性別意識來製作與報導新聞，以新聞落實部落的性別平權，或引發更多對部落性別議題的關注。

原住民媒介中需要更多富含性別觀點的報導與節目。綜觀目前的新聞，原住民女性形象的呈顯仍嫌不足，也常囿限於傳統性別角色的框架。然而在歷經時代變遷的部落轉變中，女性蘊含了豐富的報導題材，可涵括歷史切面、部落階級與青少年世代等多元面向的觀照。常態性的祭儀報導中，關於女性的參與，也應有更多社會文化脈絡的介紹，使閱聽眾理解部落信仰與社會禁忌之緣由。在媒體與部落的女性培力上，原住民媒體若能系統性地呈現各部落女頭目、婦女會及青少年社群的當代形貌，不僅能紀錄傳承部落文化的女性身影並彰顯女性視角，媒體建構的性別面向也將更多元和深刻，讓部落女性的精采生命、及其面對部落轉變的折衝與掙扎，在媒體聚焦下得到更多檢視與關注，從而使媒體成為婦女進行部落重建的網絡平台，在報導和節目中分享經驗，找到互相培力的可行途徑，重新填補逸失於原住民媒體中的女性版塊。媒體不再只是浮面地報導拙於為自己發聲或無法識別的女人，而能在語言的限制外，由女性的觀點述說部落的故事（孫嘉

穗，2013)。

原住民新聞的製播，具有傳承族群文化的意義與使命，但影像上卻常只呈現男性的紀錄，有關性別議題的女性經驗傳承，也應受到重視，讓原住民女性透過新聞傳播得到應有的文化傳承和網絡構連，傳續原住民性別文化，並在傳統和當代議題間找到涵蘊的養分及創新的契機。

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原住民女性記者對性別禁忌有不同的回應方式。觀點之一展現了對傳統文化的敬重，認為性別分工與禁忌是慣習也不應違背；身為當代原住民記者，肩負維繫及傳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而傾向遵循傳統而不願破壞原住民文化。不少持此觀點的女記者認為，部落祭儀原本即以男性為主，女性做的多是祭儀前的準備工作，以及祭儀背後的活動，所以祭儀中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她們較傾向維繫傳統的女性身分，不願因採訪而違背既有的禁忌與分工。持不同觀點的女記者則認為，原住民文化也應該與時俱進，改變部分傳統，讓女記者進入祭儀紀錄及傳承文化；這樣的想法有時無法得到族人諒解，或招致年長女性責難，認為為了記者的工作破壞部落傳統文化是不對的。因此，這些女記者也常會在族群認同、傳統與現代思潮的調適、女性意識覺醒與傳統女性位階之牴觸，以及部落長輩的壓力下，產生挫折、困惑與矛盾的感受。這些衝突不只反映出媒體工作者因性別議題而在新聞現場遇到的問題，也同時顯現了族群的身分建構：包括置身於原住民傳統社會的女性與回到原鄉採訪的都市原住民女性所具有的多重身分認同，以及性別、階級、族群認同和專業認同之間的衝突與協調。原住民女性新聞工作者面對的不只是無法進入現場採訪的限制，還有部落對女性角色的期待與部落禁忌規範。要培養具性別意識的新聞工作者，須透過不同族群記者的相互培力，並建立

採訪及製播性別議題的倫理準則，以逐步強化原住民新聞中的性別視角與性別意識。

附錄一：訪談人員及時間表

訪談者	日期	時間	時數	地點	族別	性別
A	2013/10/25	15:00~16: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C棟5樓	阿美族 每日新聞	女
A	2013/10/26	16:00~17: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C棟5樓	阿美族 每日新聞	女
B	2013/10/31	16:30~18:00	1.5	原住民電視台	賽夏族	女
B	2013/11/01	13:00~14: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賽夏族	女
C	2013/11/05	15:30~17:00	1.5	原住民電視台	布農族	男
C	2013/11/06	15:30~17:00	1.5	原住民電視台	布農族	男
D	2013/11/05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排灣族	女
D	2013/11/06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排灣族	女
E	2013/11/14	13:00-14: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達悟族	女
E	2013/11/15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達悟族	女
F	2013/11/15	17:00-18: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卑南族	女
G	2013/11/22	10:30-12:00	1.5	原住民電視台	阿美族	女
H	2013/11/22	12:00-13: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泰雅族	男
I	2013/11/22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賽夏族	女
J	2013/11/23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噶瑪蘭族	女
K	2013/11/24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太魯閣族	女
L	2013/11/25	12:30-14:00	1.5	原住民電視台	賽德克族	女
M	2013/11/25	14:00-15: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魯凱族	女
N	2013/11/29	10:00-12:00	2	原住民電視台	鄒族	男
O	2013/11/29	14:00-16:30	2.5	原住民電視台	邵族 每日 新聞製作人	男
P	2013/12/05	16:00-17:30	1.5	原住民電視台	排灣族	女

除標明為每日新聞之訪談人外，其餘皆為研究進行之2013年9-12月間，接受訪問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各族族語新聞主播。

附錄二：訪談大綱

1. 原住民祭儀中女性經常是無法參與的，煩請就製播新聞的過程中，提供幾個採訪經驗涉及性別禁忌的案例，並說明在現場中如何處理。
2. 性別因素是否會影響記者採訪任務的編派工作？
3. 在某些原住民族群特定的場域或祭儀，遇到女性無法進入時，女性記者如何進行新聞的採訪？男性記者又如何採訪男性無法進入的族群文化場域？
4. 採訪原住民新聞時，有哪些涉及性別因素的採訪倫理是在特定族群中需要特別關注與在記者的訓練中培育的？
5. 部落中的男女性別規範多有傳統規訓，然則面對當代社會男女平權的觀念影響，原住民記者在尊重族群文化傳統與因應現代性別意識提升間如何權衡？又如何製播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
6. 年輕記者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培訓以製播具性別意識的族群新聞？
7. 請以製播過的新聞為例，說明曾經製播過哪些和性別相關或以女性為視角的原住民新聞。
8. 新世代是否激發部落女性角色的反省與轉變，當部落中的性別角色與媒體專業的角色有衝突時，請問會如何因應？
9. 女性的身影為何常會逸失在原住民新聞中？
10. 紀錄時遇到什麼樣的性別禁忌？女性文字記者和男性攝影一起出訪製播新聞時，是否仍會以男性攝影記者的拍攝視角製播新聞，如何處理其中的性別權力問題呢？
11. 為何原住民族電視台大多是女性記者，然而在新聞呈現上卻多是男性的影像？有些傳統要維護，但不同世代的女性是如何因應當

代性別意識的改變呢？又如何納入報導與採訪的議題？媒體資源如何為族群女性發聲？有哪些部落中的性別議題是想報導仍未報導的呢？

12.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原住民各族主播的播報？
13.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原住民族語新聞主播播報的文化轉譯問題？
14. 如何產製具有性別意識的原住民族群新聞，與進行原住民記者與主播的性別培力？

參考文獻

- 王嵩音（1998）《台灣原住民與新聞媒介——形象與再現》。台北：時英。
- 田哲益（2003）《台灣原住民生命禮俗》。台北：武陵。
- 台東縣政府（2008）《傳達薪藝——雅美（達悟）族傳統手工藝文化圖錄》。
台東：台東縣政府。
- 林靜玉、楊仁煌（2012）〈無形文化財與原住民族——以南勢阿美族歲時祭儀為例〉，《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學刊》，2: 44-71。
- 洪仲志（2014）《夾縫中的美麗與哀愁——原住民婦女的生命歷程與回響》。
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 夏曉鵬（2001）〈原住民婦女與教育學習：解構與重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山海雜誌社承辦「原住民婦女福利會議」，12月7、8日。
- 孫嘉穗（2013）〈原住民媒介逸失的女性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4: 134-137。
- 孫嘉穗（2014）〈原住民新聞與文化翻譯：由媒體文化工作者探看原住民新聞的文化翻譯〉，《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7(2): 1-40。
- 張錦華（2014）《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權——以原住民族為例》。台北：黎明文化。
- 張敬婕（2009）《性別與傳播：文化研究的理路與視野》。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梁莉芳（2006）〈女性主體與知識的建構——以 linahan 的阿美族女性為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家庭與婦女教育，6》，49-64。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連皓琦（2013）《賽德克語太魯閣方言禁忌語與委婉語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

- 黃美英 (2006) 〈「不一樣」的女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家庭與婦女教育，6》，5-8。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陳金燕 (2013) 〈台灣重要民俗文化資產的性別平等檢視〉，《女學學誌》，32: 135-160。doi: 10.6255/JWGS.2013.32.135
- 陳枝烈 (2006) 〈排灣族的性別文化初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舞動民族教育精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論叢：家庭與婦女教育，6》，27-46。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陳昭如 (2013) 〈還是不平等：婦運修法改造父權家庭的困境與未竟之業〉，《女學學誌》，33: 119-169。doi: 10.6255/JWGS.2013.33.119
- 蔡佩含 (2015) 〈想像一個女獵人：原住民山海書寫裡的性別／空間〉，《台灣學誌》，11: 1-15。doi: 10.6242/twnica.11.1
- Byerly, C. M. (1995) News,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women's feature service in world news. In A. N. Valdivia (Ed.), *Femin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Global diversities* (pp. 105-122). Thousand Oaks: Sage. doi: 10.4135/9781483345383.n5
- Byerly, C. M. and Ross, K. (2006) *Women and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Carter, C., Branston, G., and Allan, S. (1998) *News,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吳富盛、陳芸芸譯 (2004) 《性別新聞學》。台北：韋伯文化。
- Campbell, K. K. and Keremidchieva, D. Z. (2006) Gender and public address. In B. J. Dow and J. T. Wood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ender and communication* (pp. 185-199). Thousand Oaks: Sage. doi: 10.4135/9781412976053.n10

- Cheshire, J. and Gardner-Chloros, P. (1997) Communicating gender in two languages. In H. Kotthoff and R. Wodak (Eds.), *Communicating gender in context* (pp. 249-28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doi: 10.1075/pbns.42.12che
- Christmas, L. (1997) *Chaps of both sexes? Women decision makers in newspapers: Do they make a difference?* London: Women in Journalism/British Telecom.
- Friesen, G. (2004) Interpreting aboriginal cultures. In D. J. Robinson (Ed.), *Communication history in Canada* (pp. 4-12). Ontari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 Gill, R. (2007) News, gender and journalism. In *Gender and the media* (pp. 113-14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lobal Media Monitoring Project (2005) Who makes the news? In *Global Report 2005*. [online] . 2016/4/15.
Available: <http://whomakesthenews.org/articles/2005-global-report>
- Hanitzsch, T. and Hanusch, F. (2012) Does gender determine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view? A reassessment based on cross-national evi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3): 257-277. doi: 10.1177/0267323112454804
- Hodkinson, P. (2011)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黃元鵬、吳佳綺譯 (2013) 《媒介、文化與社會》。台北：韋伯文化。
- Kincheloe, J. and Steinberg, S. R. (1997)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in multiculturalism. In *Changing multiculturalism* (pp. 137-168).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ewallen, A. (2010) Beyond feminism: Indigenous Ainu women and narratives of empowerment in Japan. In C. Suzack, S. M. Huhndorf, J. Perreault, and J. Barman (Eds.), *Indigenous women and feminism: Politics, activism, culture*

- (pp. 152-177). Vancouver: UBC press.
- Macdonald, M. (1995) *Representing women*. London: Edward Arnold.
- Okin, S. M., Howard, M., and Nussbaum, M. C. (Eds.) (1999)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kow, L. F. and Wackwitz, L. A. (2004) Voice in 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L. F. Rakow and L. A. Wackwitz (Eds.), *Feminist communication theory: Selections in context* (pp. 93-109). Thousand Oaks: Sage.
- Sakr, N. (Ed.) (2004) *Women and media in the Middle East: Power through self-expression*. London: I. B. Tauris.
- Torkkola, S. and Ruoho, I. (2011) Looking for gender equality in journalism. In T. Krijnen, C. Alvares, and S. Van Bauwel (Eds.), *Gender transform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s on gender and media* (pp. 203-220). Bristol: Intellect.
- Van Zoonen, L. (200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Sage.
- Weiner, G. (1994) *Feminisms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ood, J. T. (2006) *Communication in our lives*. 4th ed.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董璐譯 (2009) 《生活中的傳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Zabaleta, I., Xamardo, N., Gutierrez, A., Urrutia, S., and Fernandez, I. (2010) Language development, knowledge and use among journalists of European minority language media. In J. E. Richardson (Ed.), *Language and journalism* (pp. 44-60). Oxon: Routledge.

Gender Issues in Indigenous Television News

Chia-Sui Sun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gender issues as seen in indigenous television news in Taiwan.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in indigenous media is involved with gender norms, taboos, and cultural regulations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different indigenous societies. In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gender issues influence indigenous anchors and reporters in interview and broadcasting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gender bias affects the ethnic images produced and presented in indigenous news. This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indigenous news professionals encounter when considering gender cultural space in the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what gender issues are involved in indigenous media.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different indigenous ethnic news reporters and anchors in indigenous television news. The research revealed ways gender factors influenced news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t identifies key gender issues and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indigenous news production that embraces both gender awareness and multicultural gender images.

Keywords: gender, ethnicity, media, indigenous television news, indigenous journalists

◎作者簡介

孫嘉穗，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主要教授課程：傳播與文化、新聞採訪寫作、消費社會與流行文化、性別與新聞、族群新聞。

〈聯絡方式〉

Email: suncs@mail.ndhu.edu.tw; suncs@hotmail.com